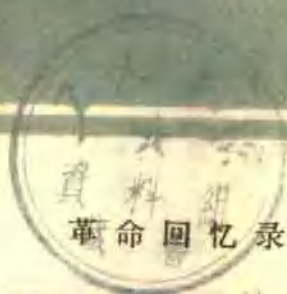


文艺作品选

第八辑



在周副主席身边

龙飞虎 宋生发 著

作家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本書包括兩篇革命鬥爭回憶錄。前一篇選自“跟隨周副主席十年”。作者龍飛虎通過西安事變、長沙大火、新華日報的鬥爭、毛主席飛重慶等事件，概括而有力地闡明我黨為了國家的存亡，團結抗戰，爭取國內和平的政策；真實而生動地描述了周副主席深入蔣管區奔走轉旋，艱苦工作以及簡樸的生活與和藹可親的高尚風格。同時也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反人民的險惡毒辣的面目。後一篇選自“跟隨陳毅同志打游擊”。內容寫陳毅同志在贛粵邊山地區領導游擊戰爭時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和風餐露宿、戰勝困難的革命樂觀主義氣概。對陳毅同志與戰士同甘共苦的生活作風也刻畫得極為細膩、深刻。

在周副主席身邊

龍飛虎 宋生發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口)

北京西便門大街郵政管理局對面電話二〇五二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

字數 28,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2 插圖 1

1952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52年5月北京第一印

印數 0001—45,001 冊

統一書號：10020·1453

定 價：(1) 0.10 元

目 次

在周副主席身边 龙飞虎(1)

深山雪夜 宋生强(27)

在周副主席身边

龙飞虎

一 西安之行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扣住了蔣介石，爆發了“双十二”事變。那時我在紅軍大學二科學習，聽到這件事情，非常高兴。提起蔣介石，我們痛恨之入骨，他“剿共”剿了上十年，杀害了我們很多同志，这下給捉住了，真大快人心！

12月14日上午，我們正在上課，校部突然要我和邱南章、龙家貴、楊家堡四个人馬上到校部去。

中午赶到了校部。副教育長刘亞樓同志听說我們来了，亲自赶到室外来迎接。我們一放下背包就問他要派我們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他沒有直接答复，只是叫我們先到軍服工厂量衣服。当天我們每个人都做了一身灰色的国民党式的棉軍裝。晚上，刘亞樓同志請我們吃飯。吃飯时他把我們每个人都看了一下，然后笑着說：“小鬼，你們有福气，要坐上飞机啦！”我們听了都高兴得跳起来，想問个究竟。他却說：“具体任务，到李克农同志那兒去問。”

我們四个人兴冲冲地跑到李克农同志那里，他热情地招呼我們坐下，然后說：“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西安，派你們去当衛

士，願意嗎？”我們一听是保衛周副主席，打心里高興，哪有不願意的呢？李克农同志笑了笑，又說：“你們都是在紅旗下飄大的，又是保衛干部，黨信任你們，才把保衛副主席的任務交給你們。”接着他教了我們一套有關國民黨軍隊的禮節和待人接物的辦法。最後他說：“任務艱巨啊，小鬼！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出發。”我們向他敬了禮，連蹦帶跳地跑了出來。

回到宿營地，已經很晚了，可是四個人都睡不着覺，躺在炕上望着窯頂，一想到要去保衛周副主席，恨不得馬上就到了副主席身邊。這一夜的時間顯得特別長，老不見天亮，我不時啐口痰，怨起老天來。

15日清晨，天剛剛亮，我們一翻身就跳下炕來，飛快地去找周副主席。一跨出門，啊！好大的雪，黃土高原變成了白銀世界，大雪紛飛，西北風象刀子一樣割人。天氣雖然冷得滴水成冰，但是我們感到心里非常暖和，一點也不冷。冒着風雪，跑啊！跳啊！終於見到了周副主席。他也穿着一身灰色的棉軍裝，蓄着又長又黑的大胡子，兩只眼睛炯炯發光。我剛見到他時，的確有些畏縮，不敢和他多說話。過了一會我們就出發了，二十幾個人騎上從騎兵團挑選來的二十幾匹蒙古馬，每個警衛員都佩帶一支二十响手槍。雄赳赳地顯得很威武。冒着大風，踏着白雪，我們向延安進發，要到延安轉乘飛機去西安。副主席騎的是一匹栗紅色的大馬，他在馬上不時地側轉頭察看路兩邊，又和靠近他的同志談話。一直走到天黑，才在安塞附近的一個莊子里住下來。這個莊子只有十八戶人家和一些破窯洞。晚上我們就擠在兩個窯洞里睡覺，副主席也和我們

挤在一起。他一直忙着招呼别人睡觉，我們向他說，你騎了一天馬，先去休息休息吧！他不肯，非要別人睡了他再睡。这天晚上，副主席知道我們是由紅軍大學調来的，就問起学校里的情况，我們一一告訴了他，他滿意地点点头，接着又問我們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資產階級？我說知道一些，就講給他听。他听了后鼓励我說：“好嘛！以后还要努力学习。”我們点了点头，感到特別亲切，早上那种畏縮心理一下子都消失了。

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住地。这一天天气特別冷，北風呼呼，砭人肌骨，周副主席身上只加了一件棉大衣，我們都担心他吃不消，然而他一路上有說有笑，好像不感到冷。下午，我們赶到了延安。这时延安城还被国民党土頑軍隊占着，国民党的“县太爷”黃仁坤听說我們来了，慌里慌張地下令給他的保安队，不准我們进城。我們只好繞到南家坪，又找了兩個破窑洞住下来。

天蒙蒙亮，我們又上路了，因为国民党不讓进城，只好从棗園插到杜甫川，走另外一条道到飞机场去。这是一条小道，又窄又滑，很少有人走，騎馬就更难通行，大家只好下馬步行，我們怕副主席滑倒，走到他身边想攙着他走，副主席一看，笑了起来，并說：“嗨！你們真把我当成老人了，我可不比你們这些小青年差勁，不信来比比看！”說着他就在陡滑的山道上輕捷如飞地走起来。

走到七里鋪，隱隱約約地传来了飞机声，我們就停下脚步側着耳朵傾听，声音漸漸加大，果然飞机来了，不一会，就在延安城上空盤旋起来。为了赶乘飞机，周副主席就拿出一張名

片，叫徐參謀到延安城里去見國民黨的縣長，讓我們進城抄近路去飛機場。

延安城里的國民黨縣長是個老土頑，徐參謀說爛了舌頭，他還是不讓我們進城，徐參謀的臉氣得煞白跑了回來。我們只好從城外轉道延安东門，傍着蜿蜒的延河到飛機場去。

剛剛進入飛機場，張學良派來接我們去西安的一架波音機正好停下來。這是張學良的專機，坐不下二十多個人，有些同志被留下了，我和楊家堡同志就擠在行李艙里。下午一點鐘，飛機從延安起飛了。當時正下着大雪，鵝毛似的雪花漫天飛舞，天上地下白茫茫的一片。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飛機在西安南門機場降落了，張學良派了人來迎接我們。我們下飛機后就坐上汽車進城，這時天已經昏暗下來，沿街의商店大部分关了門，路上行人很少，到處都是荷槍的士兵，空氣很緊張，好象大戰臨頭似的。後來才知道，當時的確是大戰臨頭了，親日分子何應欽指揮兩路大軍向西安夾擊，并企圖派空軍轟炸西安，妄想用武力壓下人民的抗日要求。

當時西安城里相當混亂，為了不驚動人，進城后我們先在東門一個名叫王鐵匠的家里休息。因為快要同張學良等會見了，有位同志對副主席說：“請把胡子修一下吧。”副主席不僅接受他的意見，還接着說：“干脆剃了吧！”當時紅軍生活非常艱苦，連刮胡刀都沒有，王鐵匠家里也沒有剃刀，副主席說：“弄把剪刀就行了。”于是找來了一把大剪刀，副主席就對着鏡子剪起來，剩下的胡楂長短不齊，可副主席倒挺滿意。後來，張學良見到了周副主席，第一句話就問：“你的胡子呢？”副主

席說：“剪掉了。”張還惋惜地說：“唉，這麼長的胡子剪掉多可惜！”

在王鐵匠家里休息了一會，我們便搬進張學良公館。張公館是三幢三層樓，張學良住在中樓，周副主席和我們住在東樓，蔣介石就關在前面的高桂滋的公館里。當晚張學良和楊虎城就設宴招待我們，是中餐西吃，張、楊兩位將軍親自為我們分菜。

周副主席到西安后就忙碌起來，每天出去很早，回來很晚。那幾天，西安的形勢也確實緊張，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官兵氣憤填膺，一致要求把蔣介石殺掉；南京親日分子指揮的“討伐”大軍逼近潼關，戰爭一觸即發。周副主席整天不是和楊虎城、張學良談話，就是和蔣介石談話，還和東北軍、西北軍的軍官談話。我那時對西安錯綜複雜的局勢雖然知道一些，但是不很理解，副主席有時就給我們講，並且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詳細地講給我們聽。現在回憶起來，更深深体会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確，眼光遠大。當時要是把蔣介石殺了，不僅不能解決一致抗日問題，反而會引起國內的混戰，日寇就會乘機并吞中國。

由於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由於周副主席的斡旋奔走，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了。12月25日，蔣介石被釋放了，當天上午乘著一架銀色的雙引擎飛機離開了西安。

以後，周副主席還住在西安，到第二年的3月初，才和博古等同志一起回到延安。

在周副主席乘張學良飛機飛西安的當天，延安城就被紅軍解放了，後來黨中央和毛主席都遷來這裡，成為全國的民主

聖地。周副主席回到延安后，仍繼續为祖国的生存而奔波，經常来往于西安、南京等地。

延安南边約六十里的地方，有座劳山，是黃龍山脉的一个分支。劳山虽不怎么高，但滿山都是原始森林，陰郁郁的。在这座山上盤踞着一股国民党的政治土匪；有三百多人，这股土匪經常襲击解放区和紅軍，搶劫財物，殘杀百姓。

1937年5、6月間，周副主席从延安到西安去，和国民党談判改編紅軍問題。那时紅軍沒有小汽車，只有几輛旧的大卡車，副主席就乘大卡車去西安。那天，他坐在駕駛室里，車斗里坐着两个警衛班。早上，車子从延安出發了。誰知道这一行动給劳山的国民党政治土匪知道了，他們就設下毒計，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山谷里伏击副主席。

这天大風卷起漫天黃沙，遮住了太陽，卡車沿着山路，費力地向上爬。緩緩地穿过陰暗的原始森林，进入谷地，再向上爬。正走在两个坡之間的一段平路上，突然遭到国民党政治土匪的襲击，敌人憑着周圍山头的工事以密集的火力交叉射击卡車，一开火司机的腿就被打断了，汽車靠着路旁停下来，車上的战士馬上向敌人还击，虽然敌众我寡，战士们仍然英勇抵抗。这时，副主席疾速地拉开車門，跳出駕駛室，在同志們的保护下，沿着一条小山溝徒步走了几里山道，到了三十里鋪。駐在三十里鋪的紅軍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口气跑到劳山，但赶到那里时，敌人已逃跑了。

在这国民党預先安排的陰謀事件里，我們有几个同志牺牲了，跟隨副主席多年的陈有才參謀就是其中之一。据战士說，陈參謀負重伤后，被敌人捉住了，敌人在他身上搜到了副

主席的名片，以为他就是周副主席，便审問起来，陈參謀不仅不回答他們，而且憤怒地斥責他們的不明大義和卑鄙無耻。敌人老羞成怒，就用刺刀把他刺死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無耻，从这里充分地暴露出来了。正当我們共产党和周副主席为祖國的生存和統一，为了共同抵抗民族敌人的侵略而奔波的时候，他們却使用了毒辣手段，制造了血腥的謀杀案件。同时，这也充分看出蔣介石忘恩負义的流氓嘴臉，我們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不記旧恨，千方百计地劝說張学良把他放了，讓他活着回到南京；而蔣介石却反过来要置周副主席于死地。这是多么陰險、毒辣和卑鄙啊！

二 長沙大火

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和华东的大塊土地后，又窺視武汉。当时国民党故作姿态，演了一場“保衛大武汉”的喜劇，可是好戏不長，沒有多久，就从武汉夾起尾巴溜走了。一場喜劇变成了丑劇。

日本鬼子占了武汉，又沿着粤汉铁路进攻岳陽，企圖渡过汨罗江，进逼長沙。

長沙有我們十八集团軍駐湘办事处，地点在寿星街，周副主席从武汉撤退路过長沙时，就住在这里。办事处是二層楼房，副主席住在楼上，因为他整天里忙工作，所以楼上的电灯总是徹夜亮着的。我們几次向周副主席提意見，請他注意身体，早些休息，他每次都答应得很好，可是到半夜去看时，楼上的电灯还是亮着。

1938年10月，日本鬼子向洞庭湖進逼。國民黨大小官員紛紛向四川、廣西等地逃竄，可是周副主席、葉劍英同志和隨員們還留在長沙，處理許多重要公務。在那危急混亂的時刻，全國人民都注視着共產黨人的一舉一動，周副主席未走，老百姓的心里也就穩定，因此，在國民黨的每一次撤退中，副主席總是走在最後面，太原撤退是這樣，武漢撤退時也是這樣。

10月13日，長沙城里更混亂了，謠言紛傳，人心惶惶。當天，副主席曾叫邱南章同志打電話給國民黨當局，詢問有關洞庭湖的戰況，國民黨當局答复說：“敵人還在洞庭湖，一切平安。”周副主席就放心了，繼續伏案辦公。

夜，來到了。夜幕徐徐挂下，長沙城也漸漸睡着了，一切似乎都很平靜。到了半夜，突然人聲沸騰起來，淒厲的哭叫聲和恐怖的嘶喊聲混成一片。辦事處的同志一個個被驚醒，跳下床就往外跑，跑到屋外一看，啊！到處都是濃煙烈火，天空給映得通紅通紅。邱南章他們以為是日本鬼子飛機來轟炸了，可是沒有聽到飛機的聲音，又以為日本鬼子攻進了長沙，可是沒有聽到炮聲和槍聲。於是跑到大門口去看，只見滿街都是驚慌逃跑的人，男人女人，扶老携幼，拖兒帶女，恐怖地哭着、叫着、擁擠着，跌跌撞撞，到處亂竄。有些人手上拿的東西失掉了，也沒有發覺，只顧逃命。有些人踉蹌倒在地上，人流隨着踐踏過去。眼前這一片淒慘的景象把他們怔住了，鬧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就喊住了一位中年人，要問個究竟。這人一看他們還若無其事地站在那裡，便驚奇地說：“軍隊放火燒城了，你們還不快跑，在這里等死！”他們一听是國民黨放火燒城，飛快地跑回屋子裡，把文件收拾起來。這時有個國民黨士

兵，手里拿着引火的汽油与馬灯，走到办事处大門口，一声不响地就把房子燃着了。邱南章等同志上前阻止，他們瞪着兩只狗眼大着嗓子說：“你們管不着，这是上头的命令！”說着，就在屋檐下放起火来。这时，邱南章同志便急忙跑去报告副主席，一看副主席住的房間里还是灯火通亮，副主席和叶劍英同志仍安靜地坐在案首，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他心里急的不得了，拉住周副主席，急促地說：“快！快走！”副主席一看邱南章那副緊張的样子，弄不清發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又是日本鬼子打来了，他平緩地說：“日本人还远得很嘛！”这时，火已經蔓延到院子里来了，邱南章就領着副主席、叶劍英同志和随行人員向大門走去，但是，大門口已被猛烈的火焰封住了，于是他就領着周副主席等从屋側的火里冲了出来。走到街上回头一看，大火已經把二樓吞沒了。

到了街上，邱南章去找副主席的小汽車，連影子也沒有找到。原来司机看到滿城火起，怕車子开不出去，就把汽車先开出長沙城了。汽車沒有找到，他們只好徒步走起来。街上到处是火，不能通行，就向湘江边走去。走到江边，只見黑黢黢的一片，江岸上、沙灘上拥挤着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到处是啼哭和叫喊声。为了讓老百姓走干的沙灘，周副主席等就在湿的沙灘上步行，一步一陷地向城外走去。走到城外，副主席又回过头来，眺望城里，只見長沙城上升起数不清的火头。火更大更猛了。出了城，邱南章的心情稍安定了，就把国民党下令焚燒長沙的事情向副主席講了。副主席一向是非常开朗愉快，心胸廣闊的，这次却非常憤慨，他又轉过身去，長久地凝視着燃燒中的長沙，臉上流露出怒不可遏的神情。

国民党焚燒長沙是挂著“敵寇將至，焦土抗戰”的招牌，但是日本鬼子還在洞庭湖一帶，離長沙遠得很。火燒長沙前，國民黨要人都已先後離開長沙，不是去重慶，便是去衡陽，就是周副主席和葉劍英同志等沒有走。國民黨軍隊半夜三更滿城放火，沒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周副主席當時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按理應該通知撤退，政治部部長陳誠就在城郊，可是他也沒有給一點信息。國民黨當局的用心是何等毒辣啊！

國民黨放的这把火燒了三天三夜。一座美麗宏偉的長沙城燒掉了十分之九，成了破爛不堪的廢墟，更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和傷兵葬身火窟。這件事情震動了全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紛紛要求嚴辦縱火罪魁。國民黨害怕人民追究下去，把陰謀完全暴露，蔣介石就找了三個替死鬼，把當時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備二團團長徐昆、公安局局長文重孚槍斃了，以為這樣就可以一手蔽日了。

周副主席走過長長的湘江沙灘，轉到長衡公路上，司機已在公路邊等待了，他們就坐上汽車向衡陽開去。這時天已經亮了。

第二天下午到了湘潭，在下司驛等待過渡。渡河的人啊馬啊車啊多得不得了，汽車一部接一部，象一條無尾的長龍，一時渡不過去，就在渡口等待。

國民黨火燒長沙的時候，我因公到沅陵，聽到這件事情，心里很急，擔心副主席遭到反動派的暗算，連夜搭車趕回長沙，走了兩天兩夜，第三天上午四點鐘左右到了湘潭。遇到辦事處的同志，知道周副主席已到湘潭，我才放心。趕到下司

驛，副主席正準備到衡山去，一見我來了，就問我什麼時候趕到的，我說走了兩天兩夜，剛才到。他一听我沒有睡覺，就連忙把我帶到附近一間房子里，將睡在床上的吳志堅同志叫起來，要我躺下休息，並且說：“我今天到衡山去，你先睡一覺，明天趕到衡陽。”

周副主席渡過河，發現辦事處還有一部分人和物資未過來，他就在渡口停下來，等待人員和物資，辦理善後事宜。副主席對同志和人民的財富是極為關心、負責的，在那種危急情況下，他總要等同志們和所有的物資走完了，他才動身。

由渡口到村子里去的一條路很小，汽車開不進去，只好停在公路旁。次日拂曉準備走了，到公路上一看，汽車不見了。大家很著急，就分散去找，當時天還不大亮，過往的人多又雜，查不出是誰偷的。這時副主席發現我也在找汽車，他就說：“你怎么也起來了！快回去睡覺，汽車丟不掉的。”找了好久，終未找到，司機氣得直跺腳，副主席安慰他：“不要急，車子不會丟的。”副主席早已料到，這是國民黨特務搞的鬼，故意把汽車開跑了。

汽車沒有找到，副主席只好乘辦事處的救護車到衡山去。一路上都是從前綫敗退下來的國民黨軍隊，三五一羣，灰溜溜地走着，一支槍象千斤重擔似的，把背都壓彎了。這些潰不成軍的軍隊，從長沙一直拉到衡陽。

以後，我們到了衡陽，找到了周副主席的小汽車，原來是白崇禧的部隊（輜重團）在南岳偷着用大卡車拖到衡陽附近來了。我們派人去要，國民黨部隊不給，後來還是由白崇禧寫了一封信，才把汽車要了回來。

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海外的愛國華僑，聽到八路軍、新四軍在極端艱苦的情況下，英勇抗日，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愛國捐獻運動，獻出了很多錢，購買通訊器材，醫藥物資支援抗日。這些器材都是先從香港運到蔣管區，然後再轉運到解放區和抗日前線。在長沙撤退時，這些物資都由我們辦事處人員帶着走，一直帶到衡陽，堆放在市郊公路上。

在湘潭下司驛休息不久，我就按照副主席的指示趕到衡陽去了。在衡陽市郊公路上，遇到我們辦事處看管物資的同志，我一見他們就跳下車問副主席住在哪裏。他們說還在衡山，並說他快要到這裏來了。於是我就坐在公路旁邊等起來。

下午四點鐘左右，一輛救護車穿過人羣向前駛來，我認出那是我們的救護車，就跑着迎過去。

副主席一跳下車，看到公路兩邊堆滿着器材，轉過臉來就問我：“東西為什麼堆在這裏，不疏散隱蔽起來？”我說：“我不知道，我剛才來到。”他嚴厲地說：“你怎麼剛才到？你不是來了一個多小時了？我一下車就管，你為什麼不管？”我一聽臉立即通紅了，再沒有說的。副主席立刻召集在場的同志分頭找地方，很快就把物資疏散隱蔽好了。副主席也和大家一起搬運，弄得滿身是汗。

這件事情對我教育很大，現在想起來還那麼深刻，副主席一下車就發現器材堆在公路上，很容易遭到敵機轟炸，可是我就沒有想到。從這裏可以看到副主席對黨對人民對革命利益的高度負責精神。

三 曾家岩

1938年12月間，周副主席經衡陽、桂林來到了重慶。這是一座古老、雄偉的山城，揚子江、嘉陵江在它腳下滾滾流着。

重慶，早就國民黨的陪都了。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就躲來這座“天府之國”的山城。正象人們常說的那樣，禍殃子移植到那里，那里的危運就開始了。重慶自成為陪都那天起就開始了巨變，貪官奸商象蝗蟲似的飛來，加上敵機凌空狂炸，逼得許多平民無論酷暑凜寒只好露宿街頭，失業人數激增，物價飛漲，街頭巷尾經常橫倒着餓死的人。同時這里遍地特務、滿街狼犬，更使這座秀麗的城市，籠罩着血腥恐怖。

副主席到了重慶，住在曾家岩一座小樓里，辦公也在這兒，當時被稱為“周公館”。不過，這座“周公館”的里外環境是經過國民黨當局苦心安排的。小樓座落在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公館側面的一條胡同里，馬路直修到戴笠公館的門口，副主席上下汽車都得徒步走過一段狹窄的胡同，小胡同的兩側，還有三四家茶館和幾個烟攤子，這些都是戴笠布下的“坐墊”。公館的小樓是三層。我們住在一、三層，第二層由另外兩家住用：一家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一家是國民黨銀行的工作人員。這些“員”也都是戴笠安下的“內勤”。傳達室只有一半是我們的，另一半住着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更絕的是，在去防空洞與廁所的路上也住着一家特務。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出，副主席是生活在怎樣的環境里。副主席的衣食住行，隨時都受到特務甚至戴笠本人的嚴密監視，就連我們這些工作人

員的一舉一動，都還跟着四、五個“警衛員”哩。

與副主席到重慶的同時，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也擴充了人員，并由機坊街搬到紅岩嘴。紅岩嘴位于嘉陵江畔，是座孤零零的山。起初山上只有我們辦事處一幢三層樓，倒相當清靜幽雅。可是不久，國民黨便把國民參政會遷來了，同時修建起許多高樓小舍，暗設下許多特務據點，把辦事處重重包圍起來，辦事處所有人員都受到監視。所以當時許多同志都憤慨地稱这里是“文明監獄”。

1941年1月，蔣介石製造了震動中外的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反动派這一滔天罪行，立即遭到國內外一致反對。中國共產黨嚴厲地駁斥了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亂命”，并把新四軍編建為七個師；全國人民紛紛集合遊行，痛憤聲討；國外華僑也喊出了正義的呼聲。但是，當時也確實有一部分人，對這陰雲密布、前途艱危的時局，憂慮深沉，思想混亂。皖南事變後，有些民主人士悲觀失望地說：“完了，國共合作算完了！”有些社會名流則痛心地说：“中國要亡了！”還有些人則公開叫喊要“共產黨放下武裝”“不要另起爐灶”等等。我們少數不大懂策略的同志，對蔣介石的毒辣手段，更是深痛惡絕，無法忍抑胸中怒火，一致要求：“跟他干！”“先打了再講！”

在那些日子裡，副主席整天的東奔西走，忙得不可開交。他拜訪國民黨元老，反復地同各民主黨派接觸，闡明共產黨的政策，扶持國民黨內部的抗戰派，給民主黨派指出方向，鞏固統一戰綫；同時，無情揭露了何應欽等親日派的陰謀，狠狠打擊了投降派的凶焰，使蔣介石頑固派不敢輕易擴大內戰，不